

■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

荣开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是巨大的,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二是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力图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 中华民族; 复兴; 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1-0007-08

On Mao Zedong's Pioneering and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ONG Kai-ming

(Hube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made enorm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was pioneering and foundational. These were highlighted in three ways as follows: (1) He set up the revolutionary road and the the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help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ir emancipation, and opening a new era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2) He pioneere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road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changing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d providing political premise an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3) After the socialism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Mao Zedong exerted his utmost effort to pursue the ro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ifferent from the Soviet wherea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Despite many twists and turns in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originally theories and the tremendous progress achiev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and material basis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Mao Zedong; Chinese nation; rejuvenation; contribution

① 收稿日期: 2013-03-10

作者简介: 荣开明(1931-) 男,湖南醴陵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是巨大的,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党成立以来紧紧依靠人民做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4-5}以三件大事作主题和线索进行考察,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 开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既与中国旧民主主义相联系和区别,又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问题,创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使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此站立起来,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当今的外国人谈论中国,往往不理解中国人搞发展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快的速度。其实当今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全球化而带来的痛苦、挫折和教训以及由此抗争、奋起和复兴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说,每一个中国人想起那一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所以,中国人总有那么一股民族复兴的心结和劲头,而且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奋斗,创造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毛泽东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杰出继承者和伟大开创者。他的首要功绩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创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其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搞革命,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说“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个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清楚。”^{[2]300}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现成经验,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的探索中去创造性地解决。刚刚播出的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927—1932年党的艰辛探索历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逐步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首先来自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来自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逐步探索,来自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科学分析。当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社会革命思想的领悟。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坚信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通过革命,赢得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一直留在国内,扎根基层,注重调查研究,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亲身调查研究的产物,体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他批评陈独秀,指出中央犯了三个大错误,有三大教训:一是不要领导权;二是不许农民革命;三是不要武装。1927年在秋收起义中,当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无法实现时,他说服战友们,成功地把队伍带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后,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可是,有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钦差大臣”,不仅不支持毛泽东的探索,反而给他扣上“狭隘经验论”、“农民意识”、“富农路线”等帽

子 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给毛泽东的各种“处分”竟达 20 次之多。毛泽东虽身处逆境, 却胸怀大局, 冲破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坚定不移地推进“井冈山道路”。相继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作, 论证“井冈山道路”的必然性、正确性。1930 年, 他还针对当时的理论争议, 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 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倾向, 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在群众斗争中、在实际经验中产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指导下, 党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4 年, 先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等十几个根据地,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大发展, 党员从大革命失败后的 1 万人发展到 30 万人, 红军发展到 30 万人, 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但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取得上述独创性成果的同时, 党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却由于对中国革命规律整体上认识不清, 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 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 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取得城市起义的胜利, 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到 1935 年 1 月召开遵义会议, 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3]388}。此后,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创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及其理论体系新颖、独特, 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 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 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 已不是旧民主主义, 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而是新民主主义。”^{[4]665} “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 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 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4]651-652} 企图不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那只是空想。混淆两个革命阶段, 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把第二步革命任务放在第一步进行, 也是错误的。割裂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 搞二次革命论, 同样是错误的。两步走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 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 将两步革命联结起来, 创造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 无须民主革命后, 再由无产阶级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回答的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的问题。在什么样的革命的问题上, 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作了回答。认为这一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这一革命的首要的问题是革命归无产阶级领导还是归资产阶级领导, 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标志, 也是衡量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忘记了农民, 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 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 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也就没有一切革命”^{[5]106-107}。最复杂、最关键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革命对象, 后者是革命动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对敌人的妥协性, 总的特点是动摇, 要对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怎样革命的问题上, 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作了明确的回答 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必须坚持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主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 必须首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开展武装斗争 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农村根据地 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最后夺取城市。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4]613}。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就等于正确地理解了全部中国革命。

显然,上述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在它的光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这对东方和其他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斗争,求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6]794}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中国出现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它已经不止是一种理论,而是亿万人民正在日夜辛勤建设的现实生活。”^{[7]22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8]267}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不仅不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贡献,反而是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结果,使中国走了弯路。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质上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唯物史观。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只要尊重事实并了解中共历史发展的人都明白,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确定的目标。建国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毛泽东等领导人主张先搞十几年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1953年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后,改变了建国后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那是因为客观实际的变化而改变了原来的主观认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此一问题认识上的新变化,“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的产物。”^{[9]215}胡乔木在《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10]353}

究竟当时出现了哪些客观因素使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产生了新的认识呢?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需要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而国营经济是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结果。解放前夕,国民党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人民政府

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业企业,使国营工业的产值在 1949 年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34.7%,到 1952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 56%。国营批发商业占全国批发商业总额的份额,1949 年到 1952 年由 23% 增加到 60%。银行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经济弱小,发展艰难。通过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把中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显然不可能。“三反”、“五反”运动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本性及其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进而加强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

三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紧迫要求。土改后,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落后,资金短缺,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使用机器耕作,发展多种经营都难以做到。且有部分贫困农民因天灾疾病等原因,重新陷入贫困状态,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不仅不能适应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发展资金等方面的需求,反而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障碍。陈云经过调研后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11]328-329}故而加速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也成为当时的必然。

四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严密封锁我国,不仅不能获得任何援助,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和交往,逼着我们只有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是依靠苏联帮助设计的 156 个项目,开始了 694 个大中型项目的工业建设。

由上可见,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并非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适应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战略需要;并非走弯路,而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至于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很适当,这些确实是当时出现的偏差或失误,但这并不是当时形势的主流。

必须指出,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一是破除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模式,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道路。在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二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营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但未能实践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四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做法,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五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正是这些突破和创新,使得这场来势凶猛、震荡剧烈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工农之间及其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功。《决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6]800-801}邓小平也明确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2]302}

在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毛泽东还于1954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我国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提出以苏为戒,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力图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对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于探索的时间长(1956—1976年),探索的进程曲折起伏,成功和失误相互交织,探索中还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故而至今人们的认识都不尽一致,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其作出科学辩证的具体分析。邓小平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分析和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邓小平认为这二十年的探索要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12]302}其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3]2}。“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3]294—295}“一九五七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3]115}“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13]253 234}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13]136—137}“但是指导思想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3]234}后一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探索。“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13]137}“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12]314}“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12]302}“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2]149}“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12]346}。所以定性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说成‘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2]365}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12]305}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恢复中日外交关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都是那段时间办成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12]304}可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将这些分析概括起来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4]10}

从宝贵经验看,毛泽东 20 年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些经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这些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例如,党的八大前后和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调整的探索中,曾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变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要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在宝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在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又不能提供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难题的现成答案,这就使得我们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错误,在错误面前也不容易形成共识。于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不仅使得正确思想没能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失误。对于已经发现的照搬苏联模式而带来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邓小平说得好:“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2]300}“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3]272}

从理论准备看,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理论准备。这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改革开放后继承和坚持。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二是毛泽东已提出但未坚持的理论观点,重新恢复和弘扬并使之系统化。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党的八大已经提出,反右后重提阶级斗争,并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逐步地陷入误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完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2]182}薄一波认为:这是“用更科学的语言、更精确的表述方式重新恢复和肯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9]632},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毛泽东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阐发过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宝贵思想。但后来却中途放弃。改革开放后参照毛泽东的论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阐发和论证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运行机制统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中,十四大还以此为理论基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目标。在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也有这类情形。三是对毛泽东在探索

中萌发的一些零散思想或思想火花加以升华 形成为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就是依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和将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思想而加以系统化的。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也是参照毛泽东关于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而加以发挥和系统化的。诸如此类的情形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从物质基础看,改革开放前30年 我国GDP年均增长7.4% ,比西方大国快两三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人才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物价基本平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6]804}

上述一切表明,对待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相互联系更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必须看到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5]。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江泽民文选(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1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1] 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15] 习近平在新近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发表的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13-01-06(1).

(责任编辑 龙四清)